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碩士學位論文

# 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선량한 차별주의자 - 중국어번역논문)

濟州大學校 通譯翻譯大學院

韓 中 科

이자가

2021年 8月

# 善良的歧视主义者

(선량한 차별주의자 - 중국어번역논문)

指導教授 김중섭

이 자 가

이 論文을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으로 提出함

2021 年 8 月

이자가의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을 認准함

審査委員長 \_\_\_\_\_

委 員 \_\_\_\_\_

委 員 \_\_\_\_\_

濟州大學校 通譯翻譯大學院

2021 年 8 月

目录

<b>第一章：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观也就不同 .....</b>	<b>2</b>
多数人受歧视论 .....	2
没有歧视吗? .....	3
看似平凡的特权 .....	6
倾斜的公正.....	12
<b>第二章：我们站的地方并不是一成不变.....</b>	<b>16</b>
弱者与弱者，未能成功联合起来 .....	16
理解复杂世界的简单方式。 .....	17
移动的界线.....	23
在岔路口发生的事情 .....	26
<b>第三章：鸟看不见鸟笼 .....</b>	<b>31</b>
标签与污点.....	31
想法成为现实.....	32
那些“选择”歧视的人.....	36
鸟看不见鸟笼.....	42
<b>第四章：玩笑话中却让人想拼命的理由.....</b>	<b>45</b>
你笑的理由.....	46
称呼的权利.....	50
没有反应的反应.....	53
<b>第五章：认为某些歧视是公平的想法.....</b>	<b>56</b>
食用油套盒、女士、工作牌 .....	56
认为歧视是公平的想法.....	57
具有偏向的能力主义 .....	60
能力不只一种，也不是全部.....	64

# 第一章：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观也就不同

## 多数人受歧视论

2013 年七月，一名大喊自己是社会弱者的男子在汉江投河自尽。该男子生前用高亢的语调批判女性,说她们“只知道让男人掏钱，却从不知道出钱”。他认为，女性在享受福利的同时却并未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妇女家庭部、女性配额制、女性专用设施等专为女性服务的制度是对男性的一种不合理的歧视。

他认为自己是男权运动家和完全主张 AA 制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多年来，该男子主张废除妇女家庭部，理由是为了使男性不被冷落，使男女平等。他抗议道，认为自己被贴上厌女主义者的标签很委屈。

“如果我讨厌女性的话，又怎么能批评的这么仔细，我是真心爱护女性与尊重女性的”。

他真的是在追求男女平等吗？

2016 年 5 月，在江南站附近的商家卫生间里，一名自称“被女性歧视”的男子，挥刀刺死了一名女性。以此为起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被更加鲜明的凸显出来。女性提高包括性犯罪在内的厌恶女性的犯罪的嗓门，而有些男性则发声道，认为自己被女性视为潜在罪犯而感到委屈。一方面有人要求停止对女性的歧视与暴力，另一方面又有人不停地主张为女性服务的政策是对男性的一种歧视。

虽然双方的立场看上去相反，但讽刺的是，双方说的都是歧视。双方都在推崇平等的价值观、批判现实，认为韩国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只是双方在谁处于不利状况上的判断完全不同。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女性曾经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所以国家把伸

张女性人权作为一个政治课题来讨论不会受到任何阻扰。但是跟过去不同，现在这种局面完全颠倒了过来，男性开始反过来主张他们受到了歧视。然而，女性受到歧视对待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现人们对这种歧视的争论。以外国移民为例，从 1990 年开始，韩国的外来劳工人数急剧增长。从 2000 年开始，结婚移民的人数开始大幅增长。韩国社会更容易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同时，还开始了对尊重多文化主义多样性的讨论。2012 年出身于菲律宾的李贾思敏作为比例代表当选韩国新国家党议员，积极地响应了这种多元化趋势。但几乎同时，韩国出现了反多元化的现象。一大群人主张，劳动移民抢走了韩国人的工作饭碗、结婚移民是因为钱才结婚，韩国人民因为这些人遭受损失。他们抗议道，援助移民的政策是对韩国人民的一种逆向歧视。

当非异性恋群体开始出现在韩国人民视线中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起初，人们以“儿媳妇是男人，这像什么话？”的传统观念为基础，开始对此进行批判。2007 年以制定禁止歧视法的试图为契机，以保守派基督教为中心逐渐发起了声势浩荡的反非异性恋群体运动。他们主张，如果保障非异性恋群体的权利，人们流血流汗建立的国家将随之沦丧，基督教徒也将蒙受损失。他们还称“同性恋专制正在蔓延”，使他们遭受迫害。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保障非主流非异性恋群体的权利，是对主流群体的一种逆向歧视。

### **没有歧视吗？**

多数人因为少数人而受到歧视，这种“多数者受歧视论”是怎么能够成立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多数者受歧视论就会发现，这种歧视论只有在“少数人没有受到歧视”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人们认为即使非主流群体曾经受到过歧视，但是现在这种歧视问题已经

获得解决。因此人们才会认为那些为少数人服务的政策是对少数人的一种特别优惠政策，而这会使得相对是主流群体的人受到不正当的歧视。曾经，有一位学生在看完了一部讨论 1910 年代女性参政权运动的电影《参政论者》后这样说道“在当时，女性确实没有权利，所以她们做出了激烈的斗争。但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女性也开始参与投票，女性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受到歧视了”。

在韩国，人们认为韩国不再存在性别歧视，主要是因为开始有一些女性进入高层职位。比如，女性当上总统、在国家考试中，女性合格人数相当的多，而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事实。但实际上，在韩国政府成立后的七十年间，仅出现过一位女总统，而这位唯一的女总统还是顶着前总统父亲的光环上位的。目前为止，五级以上的国家公务员中，女性仅占百分之 20。高级公务员中，女性不到百分之 5.2（以 2017 年的行政单位为准）。而这些都被人们所忽略。

即使把这些客观数据摆在人们眼前，人们还是不愿承认存在歧视。虽是扭曲的现象，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可能的。女性成为总统或高层公务员后获得权力与地位，或者女性进入之前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很容易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善于发现这些女性，所以觉得她们的数量庞大。而某些男性在拿自己与这群女性比较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相对的自卑。一般来说，对女性不利这件事情很抽象，所以他们很难体会到。但是他们眼中却能切实地感受到某些女性比自己具有更好的条件。

我们还可以通过实验观测到，一小部分的女性却能让人误以为这个社会不存在歧视的奇怪现象。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就公司的招聘政策分别对参与研究的男性与女性进行了提问。目前，公司的女性员工占百分之 2。研究团队对往后公司招聘女性员工占比给出了三个选项，分别是百分之 50、百分之 10 以及百分之 2。这个实验测

试的是，假设参与者在该公司上班，他们对这三个选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实验结果如下：对于占百分之 50 时，女性参与者认为更公平；对于百分之 2，男性参与者认为更公平。但是对于百分之 10，男性与女性参与者都认为公平。

在平等的观念下，当男女比例各 50%才是最为理想的公平情况。但实验中，男性与女性参与者均认为女性员工占比百分之 10 是公平的，这种情况就好比提供装点门面的 token。而所谓的 tokenism 指的是，人们只接受极少部分在历史长河中被排挤的非主流群体，只是名义上地纠正歧视政策。这种 tokenism，只接受极少数受歧视的群体，还有息事宁人、平息众怒的效果。因为，就好像被告知机会的大门是打开的，给人只要努力，具备能力，谁都可以取得成就的期待。最终，现实与理想中的平等渐行渐远，还让人产生一种实现平等的错觉。

韩国的性别歧视情况如何？让我们从收入差距这一能反映性别歧视的指标来看。根据韩国就业劳动部发表的数据，女性的月工资仅仅是男性月工资的百分之 64.7（以 2017 年为准）。该项统计，客观的反映出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劣势。虽然女性从统计上来看收入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所有男性的收入都比所有的女性高。既然韩国社会并不是所有男性的收入都比女性高的完全不平等社会，所以自然有一些男性会遇见那些比自己收入更高的女性。

像这样，社会上的不平等与个人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世界存在着差距。人们对 AA 制的讨论就源于这种差距。既然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比女性更有经济优势，如果女性期待男性承担约会费用的话，这种负担会使个别男性觉得不合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周围存在比男性更会赚钱的女性，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韩国社会不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呢？既然从客观指标上来看，女性在韩国社会依旧处于不利的位置，那么男性在男女平



等政策上所感受到的不合理又是什么？

那些有关移民或者非异性恋群体造成逆向歧视的主张，同样是建立在人们认为韩国社会不存在对移民以及非异性恋群体的“歧视”，或者“即使存在歧视，但也不是不合理的歧视”的基础上的。为非主流群体服务的政策，是建立在主流群体存在歧视的前提上的，而这可能使主流群体感觉委屈。主流群体认为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歧视，所以非主流群体称受到歧视而提出需要修改政策会让他们觉得不合理和不公平。这就与之前提到过的男性认为女性在高呼安全之时，把所有男性都视为潜在性犯罪者的情况如出一辙，人们对于非主流群体把自己视为歧视主义者而感到不舒服。主流群体成员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已经不存在歧视行为，而非主流群体也并未受到歧视，只有这么认为才能让他们感到心安。

从人们的观念上来说，基本上人们都赞成平等，反对歧视。多数者受歧视论也是在歧视是不正当的前提下成立的。人们大体上认为平等这一原则不仅从道德上出发是正确与正义的，对大部分善良的市民来说，实施歧视或者以任何一种方式参与到歧视的行为中都是不被道德所允许的。那些认为韩国社会不存在歧视的想法，也只是人们殷切地希望自己不是有歧视行为的人罢了。但遗憾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存在歧视行为的人，反而更有可能做出歧视行为。

### 看似平凡的特权

电影《不当交易》（2010年）中有一句有名的经典台词叫：“持续的善意会让人误以为是权利。”电影中，这句话是对腐败检察官的一种讽刺。剧中，检察官朱阳（柳承范饰）必须看警察脸色的情况下这么说道：“持续的好意会让人误以为是一种权利。若是需要一直顾忌对方的心情，我们没法做事”。言外之意，朱阳不顾忌他人的想法，

只按照自己的想法与意志行动。善待对方只是自己的一种好意，而不是对方的权利，通过设定这么一种关系，使无礼变得合理。

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常常被用来表示要求不合理。举个例子，有人每年都向残疾人机构提供物品与经济援助。刚开始的时候，机构的人大声对提供援助表示感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表示感谢的声音变小了。几年过后，好像该机构的残疾人不知道要感谢，所以提供援助的人选择不再给机构提供援助。但是某一天，援助的人收到机构发来的消息，问为什么不再继续对他们进行援助，他的心情因此变得很糟糕。这就好比是持续的好意被人误以为是权利。于是他停止了对残疾人的援助。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韩国不断上演。残疾人对国家给予的预算不怀感激之情。事实上，他们认为向国家要求预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让人们心寒。为了方便残疾人使用大众交通工具，他们向国家要求提高预算并进行示威。路过的人们看见此情景忠告他们要“对国家要心怀感激”。人们认为对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没有施舍之心，所以示威方式是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施舍我的善意，但这不代表你有权利要求我这么做。

而这句有关好意与权利的经典台词，将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某些人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源，他们想做些好事。因为这既不会撼动他们的权力，还能让他们成为人们眼中的好人。这种施舍型的慈善与政策不是一种善意的行为。我可以根据对你的想法来决定是否对你进行施舍，这是一种控制权在我自己手中的一种权利行为。而这种权利，有权在他人要求不属于他们权利的越界行为时对他们进行谴责。

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权力关系的。在社会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所处地位，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特权。拥有金钱或者政治地位的人，他们所享受的特权比较容易显露出来。因为，特权很容易被当成部分财阀与高层权力的代名词。但实际上，特权（privilege）并

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指的是，在固有的社会条件下，因自身所处的有利位置，而享受到的各种优惠。

随着人们对不平等与歧视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开始“发现”出普通人所具有的各种特权。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发现”，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特权基本上都不是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这些特权只是人们所具备的一种条件，所以很难被人们所察觉。因此我们又可以把特权理解为：“是人们所具有的条件，是一种自然舒适的状态，甚至很难被人们察觉。”

举个例子，人们或多或少都坐过市外长途汽车。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分有经济舱和商务舱两个舱位。既然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乘坐商务舱，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将搭乘交通工具视为一种特权。而在乘坐市外长途汽车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在享受特权。但是当坐轮椅的残疾人要求乘坐长途汽车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市外长途汽车并不具备让残疾人乘车的装置，所以即使他们买了车票，也不能乘坐汽车。在这里，能乘坐市外长途汽车就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可以理解为自身具备，而他人所不具备的某种事物。

当自身所处的环境、结构以及制度，成为他人的障碍之时，我们就能发现自身所享受到的特权。在不能结婚的同性夫妻出现之前，能够结婚的人从来不会认为结婚也是一种特权。在外国人需要取得居住许可才能在韩国居住的情况发生之前，出生在韩国的韩国人从来不会认为在韩国居住是一种特权。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发现这些特权。即使是出现这样的机会，人们也可能察觉不到。

美国威尔斯林大学的佩吉·麦金托什（Reggy McIntosh）教授从参加女权运动（又名平权运动）研讨会的男教授同事身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行为。那些参加女权运动的

教授非常热衷于与女性有关的话题，但是实际上，当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将与女性有关的内容纳入到教学当中时，他们表示很难接受并且表示拒绝。看到这些善良的男性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们享有特权的现象，麦金托什认为，人们存在某种自己意识不到的特权。

麦金托什收集了作为白人的自己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并发表了相关文章，其发表的文章中包含 46 个例子，部分内容如下：

\*我没有必要为了子女的安全去教子女了解结构性的种族歧视。

\*人们不会因为我的皮肤颜色而嘲笑我边吃东西边说话。

\*不会有人要求我代表所属族群发表意见。

\*当我呼叫负责人的时候，他们只会派与我相同肤色的人出来。

\*不用担心别人会因为我的外貌、行为举止与味道而评价我的种族。

\*我在想工作的领域中，不用去问是否会征用采纳与我同种族的人。因而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如果我作为领导的信誉低的话，原因与出身种族无关。

多亏了麦金托什整理的各种详细例子，让很多白人意识到自己享有的各种特权。很多人也开始整理起其他类型的特权目录。比如男性特权、阶层特权、文化特权、国籍特权、异性恋特权、非残疾人特权、语言特权等各种特权目录。其中男性特权目录中就包括以下内容：

\*永远不会因为性别而导致升职失败。

\*不用害怕独自半夜走在公共场会有危险。

\*当呼叫负责人的时候，一定是性别相同的负责人。组织中地位越高，这种情况就越明确。

\*在驾驶时出现不小心的情况，没人会因为我的性别而指责我。

\*别人不会因为我与很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嘲笑我。

\*外貌没有很典型的魅力也不会有很大问题，并且可以忽视。

要发现这种特权其实很难。因为这些都是作为一名白人或者男性，与自己的努力和意图无关，自然而然并理所当然地具备的条件。因为人们不会因此蒙受损失，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深度思考这个问题。不必经历愤怒、恐惧、惊恐、焦虑等负面情绪。如果说存在拥有特权的信号的话，那必然是不用通过很多努力就能轻易获得信任、即使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也会觉得安全、出现问题时可以解决的一种感觉。这是一种完全配合我周围的环境，永远不用去意识周围环境的一种舒适状态。

人们能意识到特权存在的契机，是在特权受到冲击的时候。当自己不再属于主流群体、不再是以前那个让人舒适的环境时，人们才能发现截至目前自己所享受到的特权。曾经生活在韩国土地上的韩国人，某天远走异国他乡，作为异乡人，他们会对不熟悉的环境感到不安与害怕，甚至可能会生气。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就能更容易理解这些。但是对于那些类似于性别等特权，人们很难从另一个环境中去体会，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人们也许一生都察觉不到他们正在享受的特权。

但是，即使人们的地位不发生变化，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感受到那些之前自己所享受到的特权。也许人们对 AA 制的讨论就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产生的。如果所有人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没有理由会让特定群体承担费用。但长时间以来，男女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不平等，承担费用的方式也不平等。如果从最初开始，男女就是平等的，

女性就不会在经济上过度依赖男性，男性也不会因此而感受到过重的经济负担。

那么男性现在所感受到的不合理，可以看做是提醒他们之前享受到特权的信号。在现有的不平等的关系中，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可取的习俗也开始遭受人们的质疑。通过必须承担费用的负担，男生开始反过来意识到，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曾经的不平等关系开始动摇并产生裂痕，如果没产生任何变化的话，这可能不被人所知。

也许，依旧会有人对“特权”这一种说法感到不舒服。作为一名韩国人或者作为一名男性，在韩国社会生存本来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会抛出“我们享受到什么特权？”的疑问。正如不平等的概念一样，特权本就是相对而言的事物。指的是比其他群体具有更加安全舒适和有利的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是件容易的事情。

让我们以水中的鱼为例。顺流而下的鱼比逆流而上的鱼更轻松。但是顺流而下的鱼在看到逆流而上的鱼时，并不会觉得自己很轻松。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让人疲倦。并且，人们在抓住机遇并上升到更高位置时，他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

因此我们很难下结论说谁的生活更艰难，因为各有各的难处。就如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看起来再幸福的家庭都会有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机遇与权力是等量分配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难处。这里的焦点是使大家过上不同生活的结构性不平等。正因为这样，如果所有有关不平等的讨论都变成“谁的生活更加艰难”的争论，那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我们要做的是把有关“不平等使我们面对不同的困难”的讨论，变成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

如果实现了平等，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加轻松吗？先不要急着找答案，让我们

来看看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当我们要求权利和机会的时候，期待的结果并不是舒适的生活。假如我们被关起来，每天需要做的就只有吃喝睡，也不用劳动，但是恐怕没人会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甚至我们可以说用这种方式对待动物是残酷的。处于不平等位置得人，他们在要求平等的权利与机会时，所要求的的是和其他人一样能够冒险并承担风险，克服人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 倾斜的公正性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人们并不愿冒然脱离自己习惯已久的不平等状态。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re)在《非正义：服从与反抗的社会》(injustice:The Social Base Of Obedience Revolt)一书说道，那些处于苦痛，受到压迫的人，他们很难意识到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人们感受到的非正义，往往是因为自己熟悉的自然状态开始变得对自己不利。假如有人具有相对的特权，认为目前的体制很合理，他们可能会认为平等带来的进步不是不舒服，而是不正当的。

在美国，相比过去人们对种族歧视的改善程度看法的调查中，白人总是倾向于认为“改善了很多”，黑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并未改善多少”。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共同提出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荣获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应对可能发生的损失与收益之间，对可能发生的损失更为敏感，并且具有规避损失的倾向。这个理论反映出，在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改善过程中，失去特权的白人比黑人更为敏感。

那些正享受特权的人，他们可能会认为如果社会实现平等会使他们蒙受损失。如果人们把平等视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话，就会把对方的利益当做自己的损失。围绕着男女平等的争论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根据家庭妇女部发布的《2016年男女平

等实况调查分析研究》，目前韩国人认为韩国社会虽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将在未来减少。但在同时也认为在未来社会男生将会遭受不平等。如果人们把这视为对固定总量的权利的挑战，那么他人的平等都会让自己感到不平等。事实上，如果对方实现平等的话，自身也就实现了平等这件事情符合逻辑。

虽然，大部分的人赞同平等、反对歧视。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平等、禁止歧视。但是具有相对特权的群体不仅对歧视的认识更少，他们还把这当成反对实现平等举措的原因和动机。但人们不愿承认自己也存在歧视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人们总是高举民主主义与人权的口号，作为主流，他们却意识不到自己享受到的特权。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采取歧视态度的政治“进步分子”比比皆是。

问题是，这些作用大多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如果我们意识不到世界的倾斜，只是一味的寻找平等，那么我们很难找到解决不平等的方法。这就好比站在倾斜的地上，手拿平行棒子，这么一来平行棒子也已经倾斜。之前，在课堂上，我曾与学生们讨论过残疾人乘坐市外大巴这件事情。来来往往的行人乘坐市外大巴往返各地，但是从来没有人意识到残疾人不能乘坐市外大巴这一事实。与学生讨论过后，我在整理便条纸的时候，发现有个同学这么写到：“如果残疾人乘坐大巴的话，会耗费更多的时间，那他们不应该付更多的钱吗？”

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呢？他站在倾斜的世界讲述着倾斜世界所谓的公平。认为在这个以非残疾人为中心的体制下，不能踏上公交的台阶是因为残疾人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会给他人带来负担。所以他的结论是，残疾人应该比非残疾人付更多的钱才公平。这位学生从最开始就把速度与效率作为评价基准，根本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公平已经倾斜向一



方。

这与政治人士或公职人员失言的情况类似。在那些引起公愤的事件中，很多人都辩解称“自己没有那样的意图”或是“出于好心”。前庆尚北道教育局局长在培训教师时发言称：“女教师是最好的新娘人选”、“未婚女教师身价高”。他并没有把女教师当成自己的同事，而是把她们当成新娘，甚至把女性与金钱划上等号，这是一种非常侮辱人的话。教育局澄清道，教育局局长是有意在吹捧女教师，因为教育局局长本来就是民选的职业，所以对民意很敏感，因此不太可能是有意说歧视女性的话。问题是，他站在这个倾斜的世界上，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思想，让他意识不到这些话会成为侮辱他人的话。

很多人在不知不觉的追求已经倾斜的公正。韩国网民在青瓦台国民请愿公告上发帖，要求驱逐那些犯下凶残罪行的外国人，同时还辩解称自己不是歧视主义者。那些拥护宪法，支持平等与禁止歧视原则的政治人士，却反对立法保障非异性恋群体的同等权利。有些人认为他们说的话前后不一致，有的人却认为他们是对的。在有些人的眼中这个世界是倾斜的，非主流群体在这个倾斜的世界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而有些人却认为这个世界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前者想实现平等的试图却成为后者眼中出现逆向歧视的理由。

崔圭锡在他的漫画《锥子》中讽刺我们因地位和情况而变化的样子。

“你们别夸海口说自己不会那样”。

“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观也不同”。

我站在何处，看到的风景是什么，我所在的地方是倾斜的还是平的。如果是倾斜的话，那么我又站在何处。如果我们想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就需要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如果不行的话，那为了了解这个世界倾斜的样子，我们就需要与站在各个位置的人进行交流。韩国社会真正实现平等了吗？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韩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度。我们还没到可以否认存在歧视的时候，而应该进一步发现歧视。

## 第二章：我们站的地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弱者与弱者，未能成功联合起来

2018年，约500名也门难民因为也门内战逃亡到韩国济州岛。人们开始对是否接收难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根据2018年7月4日实施的舆论调查，就济州是否接收难民，46.6%的男性表示反对，48%的男性表示赞成。虽然赞成与反对的人数没有很大差异，但是赞成的人还是多一些。但女性的立场不同，60.1%的女性反接收难民，而赞成的仅占27%。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根据一些研究，处于弱势地位的弱者更容易与其他弱者产生共鸣。弱者在想到自己遭受损失的经历后，更能够理解其他弱者所处的状况，所以相对主流群体来说，他们会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这就跟佩金·麦金托什在反思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作为白人的她又享受着特权后，制作了前面的特权目录一样。但是，为什么韩国女性在面对那些受到战争迫害而逃亡到济州岛的也门人时没有表现出宽容，反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呢？为什么女性反对的比例会比男性群体高？

在反接收难民的理由中，有一条是因为他们认为“也门难民对女性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很大”。很多女性好像都对此表示赞同。人们在面对难民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当作逃亡的难民，更多的是把他们当成男性。这里，还给他们加上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男性”的前缀修饰词。很多女性在听到伊斯兰这一词时，自动把他们与性犯罪和暴力男性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女性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在这种体制下，女性既是受害者又是弱者，而反接收难民则成为女性为了保护自己所提出的正当要求。

弱者与弱者之间并没有形成纽带，韩国女性主张她们是更弱的弱者。那么身为穆斯

林难民的男性享受到了特权吗？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章提到过的男性特权。逃亡到韩国的难民与之前提到的男性特权还是有点不同。这些难民在韩国会让人觉得“他们不用通过很多努力就能轻易获得信任、即使把我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也会觉得安全、出现问题时可以解决”吗？即使韩国社会承认了难民，他们也具有同样的特权吗？韩国女性认为他们与韩国男性具有相同的权利与地位合理吗？

在那些反接收难民的集会中登场的“国民优先”口号，把这种情况更加鲜明地展现了出来。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核心在于，韩国是否接收这些难民。这个时候，那些有权下决定的人与必须受到处分的人之间形成了权力关系。韩国国民依法享有在韩国土地上生活的权力，并且具有影响政府实施有关难民政策的权力。相反，外国人在韩国并不具备以上权限。韩国国民的反对动摇了政府的决定，所以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也门人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不能入境韩国。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女性不再是作为非主流群体，而是作为主流群体在行使她们的权力。即使不是作为一名女性，只是简单的作为一名韩国人，也能相对的“不用通过很多努力就能轻易获得信任、即使把我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也会觉得安全、出现问题时可以解决”。虽然平时人们体会不到，但是这确实是韩国国民实实在在正在享受的特权。相反，济州岛的也门难民们却一直遭受质疑，被韩国人民贴上“罪犯”以及“假难民”等污名。

女性作为主流团体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这确也是事实。除了性别带来的不同地位之外，人们还具有多重地位，因为人本来就是具有多重地位的复合体。前面我们说过，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观也不同。但是我们站的位置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理解复杂世界的简单方式。**

有个单词叫 **Homo categoricus**，指的是人有进行分类的倾向。不管是人、动物、事物，人们都会习惯性的把他们作为群体进行分类。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时候碰到过的一些脑筋急转弯问题。苹果与草莓具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是都是水果。甜瓜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就模糊不清。通常，人们通过将相同事物分类的过程，进而建立一个范畴，然后以建立的范畴为基础来理解这个世界。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这么说道“人类只有借助范畴才能够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目前，地球有 77 亿的人口。光韩国就有五千万人口，我们只有借助范畴才能更容易去理解这么多的人。那么我们是怎么对人进行分类的呢？分类的方法虽然数不尽数，但是，让我们先简单的看一看性别、年龄、职业、宗教、性取向、出身国籍这些分类。根据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Banaji**）与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在《盲点》（**Blindspot**）中给出的说明方式，以下面六个标准建立了表格一（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列出所有的范畴，所以只能任选部分建立如下表格。如果有人没能被归类到以下范畴，我在此深感抱歉）。

表格一：建立范畴

性别	年龄	职业	宗教	性取向	出生国家
女性	青少年	家庭主妇	佛教	异性恋	韩国
男性	青年	公务员	天主教	同性恋	美国
变性人男性	中年	农业劳动者	新教	双性恋	日本
变性人女性	老人	教授	穆斯林	无性恋	也门

我们可以根据这六个方面对人们进行分类。比如现在正在读这本书的人，可能属于女性-青年-公务员-天主教-同性恋-韩国人的范畴（如果真的属于这个范畴，请不要感到惊讶），也有可能属于如男性-变性人-中年-教授-穆斯林-双性恋-美国人等其他组合。以这种交叉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表中的范畴建立 4096 个范畴。如果我们添加分类基准或者在分类基准内添加范畴（比如，我们可以罗列 100 种以上的职业）的话，就可以建立更多的范畴。（虽然我们可以建立范畴，但是人类仍然非常复杂，以及多样化。）

光是表格中几个简单范畴组合起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从某个层面进行分类很简单，但是交叉排列后得出超出 4000 多种结果则很难想象。相对的，我们可以将人们归纳到那些熟悉的组合，比如典型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以及职业等。马扎林·贝纳基与安东尼·格林沃尔德提到人们有初始默认值（default）。比如我们在提到“美国人”的时候，会自动联想到白人-男性-成年人。那么“韩国人”又有哪些基础特征呢？会不会是男性-中年-公司职员这种形象呢？那么也门人的初始默认值又有哪些特征？

同时，人们在不停地查找那些能划分范畴特有特征的标准。比如，我们在海外旅游的时候，总是会将他们的“国民性”对号入座。我们认为这些是，避免在陌生的环境中遇到其他人的时候惊慌失措，或者避免出现错误所收集的信息。带着这样的目的，某篇旅游博客对韩国人的性格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大概内容如下：

“韩国人很喜欢感情用事。”

“韩国人没有耐心。”

“韩国人很害羞。”

“韩国人很注重外貌。”

大家对此有何感想？假如你是韩国人，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上世纪 90 年代，外国电影中把韩国人刻画成“财迷”的形象。在 1993 年的电影《城市英雄》中，作为商店老板的韩国人，在不买东西的情况下不会帮人换零钱。1998 年，吕克·贝松（Luc Besson）出演的《出租车》（1998 年）电影中，两个韩国人为了赚钱轮流开车，一人开车，一人则在后备箱睡觉。电影中如此描写韩国人，是单纯的情景再现，还是说是对韩国人的一种种族歧视呢？

我们把这种简单的信息称之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也叫做成见。刻板印象一词，最早出现于 1700，当时指的是印刷类似报纸的金属印刷版。1922 年，美国的新闻记者华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使用了该词，该词也因此具有了现在的意义。利普曼认为，人们会根据脑海中刻画画面，来描绘那些没有经历的世界。人们能够直接体验外面世界的机会很少。但是成见会给人一种自己知道点什么的感觉。人们会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形成舆论。

问题是，在这单纯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错误。部分特征被过分泛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偏见（prejudice）。为了理解成见(以下将用成见来替代刻板印象一词)以及偏见的作用方式，下面我会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更多的分析。

就像我们前面描写韩国人特征一样，其他国家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一个国际婚姻中介网站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叫“各国新娘特点”，其中描述有关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中国女性特征的内容如下。

乌兹别克斯坦女性特征：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人们依旧具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她们依旧跟韩国 30~40 年之前的女性一样，还保持着不过问男性、尊重男性的淳朴。大部分

女性都是夫唱妇随。

越南女性特征：受母系社会的影响，大部分女性都干着农活，同时还操持家务，她们的生活能力很强，大部分的女性都顺从男性、尊重长辈。她们非常具有母爱，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一旦嫁人，对老公从一而终。

中国女性的特征：成长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女性，她们勤劳俭朴，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下也能忍耐并战胜困难。

在谈到她们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单纯、顺从、恭敬、勤劳、俭朴、母爱、生活能力、忍耐力以及“男尊女卑”（在社会的权力与地位中，男性受到优待，女性需要尊重男性）、“夫唱妇随”（妻子必须追随老公），“从一而终”等词语。在韩国，国际婚姻中介所是盈利事业。该文章是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国际联姻，所以对各国女性都尽量采用积极的形容词。但是实际上，这些罗列的特征又有多准确呢？

成见，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自己脑海中刻画的事物。人们把脑海中刻画的事物错以为是事物对象，事实上这只是自己认为的。前面提到国际婚姻网站介绍的各个国家女性特征，但事实上人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只通过这么简单的介绍就知道这些国家女性的准确特征。但是相应的，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了解到，那些想要进行国际婚姻以及那些中介机构脑海中刻画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使用顺从、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等词汇，发现他们想要维持一种男性优越主义的婚姻关系。成见，其实是一种揭露自己的价值观，对别人坦白自己的方式。

前面国际婚姻中介所网站上描述的外国女性形象。实际上，这些女性在来到韩国之后，人们看待她们的视角又会随之改变。从一开始认为她们作为顺从、恭敬的妻子能够造福韩国社会，到后来的认为这些移民会给韩国带来损失。如果人们觉得“她们来自贫



穷的国家，是因为钱才来韩国的”，觉得她们很低下，或者“讨厌在她们身上使用人们缴纳的税金”而反对援助政策，甚至对她们采取“滚回你们的国家”的恶劣态度。而这并不是移民女性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韩国看待她们的视线产生了变化。

虽然成见是一种错觉，但是它的影响力却非常大。一旦成见进入人们的脑海，它就会像电脑病毒一样干扰人们处理信息。人们对那些符合自身的成见的事情更加集中，并且更容易记住他们。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开始陷入更加确信自己信仰的成见的死循环。相反，人们会开始不太在意那些不符合自身成见的事实。即使是遇见与自身成见有矛盾的事例，人们也很难改变那些脑海中已经形成的成见。取而代之的是，把这些事例视为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成见根深蒂固的人，即使是把事实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983年，约翰·达利（John Darley）与佩奇特·格罗斯（Paget Gross）在研究中，揭示了无意识的成见对人们造成的影响。研究者们将大学生分为两个团队，并向他们介绍了一个叫“汉娜”的儿童的有关情况。研究者们在对“汉娜”的家庭环境进行说明时，分别向两个团队给出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信息。在第一个实验中，两个团队分别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对“汉娜”的学习能力进行评价，但是参与者都表示不太清楚，并表示无法只从家庭环境对“汉娜”的学习能力进行评价。实际上第一个实验中，两个团队对“汉娜”的评价结果并没有什么差异。

但第二个实验结果出现不同。研究者分别给两个团队看了“汉娜”的解题视频，但是两个团队对“汉娜”的评价结果却出现不同。被告知“汉娜”属于高收入家庭的团队对“汉娜”的学习能力评价，比被告知是低收入家庭团队更高，认为汉娜做对的题更多，行动也更积极。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虽然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成见，

但是在成见的作用下，他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受到干扰。人们总是选择性地吸收那些符合自己成见的信息，这使得判断出现偏差。

人们会根据这种区分人的界线而产生成见，态度也会随着界线产生变化。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界线是怎么作用的。

### 移动的界线

2018年2月，19名外国人为了代表韩国参加即将召开的平昌奥运会而加入韩国国籍。25名男子冰球选手中，有7名选手出身于其他国家。23名女子冰球选手中，有4名选手出身于其他国家。这其中，有些人是海外同胞，有些人是被外国人收养的韩裔。即使这样，人们欣喜地为这些没有在韩国土地上生活过的陌生外国人发放国籍，并为他们加油，把他们称为“我们”。而这不过发生在人们反对济州也门难民之不久之后。

相反，很多情况下，有些人即使在韩国生活了很长时间，韩国人民也不会轻易接受他们并把他们称为“我们”。这里有一个故事，17岁的蒙古国籍贤浩与蒙古国籍的母亲一起，从7岁开始就在韩国生活。2012年的某天，正在上高二的贤浩劝朋友别打架被叫到警察局。明明贤浩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在调查过程中，警察发现贤浩没有在韩滞留资格。于是贤浩被送进外国人收容保护所，直至被遣送回国，这个过程时间飞快。虽然贤浩在韩国生活了十年之久，但却并没有像那些为韩国人出战而获得韩国国籍的人幸运，甚至都不曾获得滞留资格。

虽然这两件事情不尽相同。只是碰巧，韩国为了奥运会严格筛选出19名外国人赋予他们韩国国籍，这与赋予几名未登录儿童韩国国籍或滞留资格完全不同。但是韩国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超越了人们单纯理性思考的移民政策。人们在接受“我们”的态度与排斥“他们”的态度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情感差异。接受的理由是什么？难道真的

是因为他们为韩国出战奥运会，为韩国所做的贡献更大吗？也许贤浩留在韩国，作为韩国的一员，他一生为韩国所做的贡献会不会更大吗？为什么人们不基于这些进行考虑，而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呢？

对“我们”与“他们”的感觉差异，成为了划分两个团体的界线。据研究发现，人们对于不是自己所属的其他群体，有将他们单一化的倾向。并且人们会认为自己所属团体的成员，更加复杂多样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相反，人们往往会认为那些不是自己所属的群体单一、同质，并且不怎么具有人情味。人们通常会放大内部团体与外部团体的差异。正因为这样，人们会以自己为中心的群体而产生拉帮结派的心境，并形成针对“他们”的成见与偏见。人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会根据这个界线而产生变化。

研究者对这个界线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感兴趣。泰弗尔（Henri Tajifel）与研究者们通过实验发现，这种界线并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划分界线可以很随意，甚至可以没有标准。1971年，在某项研究中，参与者通过观看左右排列的幻灯片来欣赏两个画家的作品，并且回答自己喜欢左边还是右边的作品。研究团队告诉参与者是根据参与者的偏好进行分组的，但实际上分组与参与者的回答无关，是随意分配的。研究团队告诉他们其中一个团队偏向于“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作品，另一个团队偏向与“保罗·克利”的作品。

该团体的成员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但就在研究团队赋予他们简答的任务后，两个团队就真的开始像“团队”一样开始行动。研究团队给参与者们发放纸张，让他们分别对两个团体成员进行评价。实验结果如下，参与者们对自己团队的其他成员给出了更高的评价。其他实验中也出现类似的结果。在假想性格的调查研究中，研究团队将参与者分为不同的团队，仅在单纯的个人愤怒这一项，人们对不是自己所属的外部团体做出了负面评价。针对这种现象，戴维·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与研究者们表示这种“毫

无根据的偏见”（prejudice from thin air）是自动形成的。

如果两个团队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研究发现，即使两个团队在没有差距的情况下，也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爆发极端的矛盾。1954年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与同事们在“罗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中，尽量将22名具有相同条件与相似背景的儿童分为两个团队参加夏令营。两个团队名字分别是“老鹰队”与“响尾蛇队”。在第一周，两个团队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在第二周的时候，两个团队碰面，并开展了排球、跳绳等有奖对抗比赛。两个团队开始互相指责、谩骂、产生敌对心，并且产生很深的暴力与矛盾。但在实验的最后阶段，让两个团队共同解决上游目标时，两个团队之间的紧张气氛才开始出现缓和。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团体间的界线其实并没有那么牢固。指向群体的界线会随着状况的变化而产生或偏移。以韩国社会为例，那些反对外国人踏入韩国、高呼“国民优先”的人，同时也认为那些为了奥运会而加入韩国国籍的外国人是韩国人。“我们”与“他们”的界线，并不是客观上的国籍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也会把“他们”视为“我们”，因为这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观念。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人们会根据界线，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内部成员更为亲切，甚至具有献身精神。而在对待那些不属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外部成员时，往往会表现出冷漠，有时甚至会表现得很残忍。

这时，介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只与出生国籍有关，还跟性别、残疾与否、年龄、宗教、家庭情况、学历、地区、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分类标准以及范畴有关。人们可以同时属于多个群体，群体的数量也因此变得无穷大。每个人都理所当然的被归类于各种层次的群体。因此随着情况的变化，那些属于受到歧视群体的人，也有可能同时属于享受特权的群体。有时，某些人因为同时属于多个受到歧视的群体，可能

一次性遭受到复合型的歧视。

### 在岔路口发生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A公司的职员中，有一半黑人，一半女性，但是唯独没有黑人女性。这是怎么回事？答案是，所有的黑人都是男性，所有的女性都是白人。因为A公司雇佣了充足的黑人与女性，所以巧妙的规避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问题。当社会提及黑人的时候，人们会想到男性，当提及女性的时候，人们会想到白人女性，而黑人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的。金柏莉·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问题。

现实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美国GM汽车公司的员工中没有一名黑人女性。在1964年之前，GM公司不曾雇佣过黑人女性，并且在1970年解雇了雇佣的5名黑人女性。虽然公司在解雇5名黑人女性后，被人们指控存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问题，但是法院认为GM公司一直雇佣了女性，所以认为该公司不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而对于种族歧视问题，法院认为需要将公司雇佣了黑人男性一起联系起来，并不认为需要单独考虑对黑人女性的歧视问题。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如果我们只是从单一角度来看歧视的话，就会出现扭曲的现象。如果从单一角度来寻找解决歧视的方式，对那些在各方面享受特权，并且只需要解决一个歧视问题的人来说很有意义。比如，如果异性恋黑人男性不存在人种歧视问题的话，他们就能成为主流群体。相应的，异性恋白人女性如果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的话，也能成为主流群体。但是，如果是同性恋黑人女性呢？正如前面提到的黑人女性的例子一样，如果只从单一层面来解决歧视问题的话，不管在哪都有得不到解救的人。黑人女性在黑人之间被边缘化，同时她们在女性之间也被边缘化，以至于掩盖了社会对她

们的歧视。

金柏莉·克伦肖指出，如果不考虑人们所具有的多重身份就会产生这种错误。她在《人种与性别交叉主流性恢复：批判反歧视理论、女权主义、反人类主义政策中的黑人女权主义》（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论文中，把交叉性比做成岔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来对此进行说明。如果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交叉的地方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能轻易的发现其中的原因吗？我们可能只从二者中选一个来进行说明，也可能将这两种歧视交叉重叠，从而形成独特的第三形态。

交叉于人种之间的性犯罪，在这种交叉性上异常的显眼。黑人男性强奸白人女性，曾一度给美国社会带来恐慌。很多黑人男性也因此受到私刑。那些要求白人女性的贞操与对玷污白人女性贞操的黑人男性愤怒的人均是白人男性。白人男性通过对黑人男性的愤怒，巧妙地掩盖了白人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行为。白人男性为了保护女性站了出来，就好像性犯罪是只有黑人才会出现的问题一样，将责难的矛头指向了黑人男性。虽然看上去像是社会在保护女性，但是这只是把种族歧视的矛盾变得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女性作为女性能和白人女性一样获得同样的保护吗？答案是不能。人们认为，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在性质上不同。因为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性犯罪被视作白人男性的一种权力，这不会被人们拿到法律中来讨论。即使施害者是黑人男性，黑人女性也处于很艰难的位置。人们害怕把黑人男性当成性罪犯会加深种族之间的偏见，所以黑人女性在受到黑人男性的侵害时，很难被付诸公论。即使同为女性，也会因为不同的肤色而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1991年，黑人女性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黑人男性大法官提名人克拉伦

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她有过性骚扰行为。当时，作为法学教授的希尔出席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听证会，并在听证会上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所作所为。托马斯回应称希尔的主张是对黑人的高度私刑，是一种种族歧视。托马斯通过“私刑”这句话把人们对自己的怀疑转移到了种族问题上，最终他还是成为了联邦大法院的大法官。相反，希尔在听证会后受到人们的指指点点，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就职的大学。如果希尔是白人女性的话，情况会一样吗？希尔处于不管是作为女性还是黑人，都被人忽略的交叉点上。

2018年，韩国人民以女性的安全为由反接收也门难民。很多人都提到也门的性别歧视文化。但这只会加深韩国人民对也门人的种族歧视，把排斥合理化。韩国人会对也门女性有多少关心呢？实际上，在济州的500名也门难民中，共有45名女性。但是有传言称，也门难民全部是男性，这个消息在人们之间广泛流传，进而被人们改造成了“事实”。这意味着，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抹去了也门女性的存在。高呼女性安全的韩国社会竟没有也门女性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1851年黑人女性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发表的“我不是女性吗？”（Ain't I a Woman）演说还经常被人提起。

我们在观察歧视的时候，如果在性别与种族上再加上国籍、宗教、出身国家、社会经济地位等其他因素的话，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从一维跳跃到二维，再跳跃到三维，甚至从更多层角度来讨论问题，几乎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法的。但是这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歧视的情况并不难理解。即使韩国女性相对于韩国男性来说受到了歧视，但是相对于外国男性来说，我们很难说韩国女性受到了歧视遇。如果加上该女性是韩国残疾女性，或者外国男性经济条件很富有等条件的话，人们就更难辨别歧视的存在了。

这个问题不仅复杂而且很难。但是我们只有考虑这种多重性，才能意识到自己既是受到歧视的一方，又是做出歧视行为的一方。虽然作为女性受到了歧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弱势的一方。受到不平等社会经济的影响，生活艰难也并不是仅是弱势一方所存在的问题。某些人因为多种原因，受到课重叠性的歧视，所以他们在受到歧视的群体中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歧视。

人们排斥也门难民的理由不仅仅与性犯罪可能性有关。还有诸如“穆斯林恐怖分子”、“杀人就跟家常便饭一样”、“不值得把人民缴纳的税金用于援助难民”、“他们不是来逃难的，而是来赚钱来了”等很多理由。人们把也门难民当成是威胁韩国人民或者与韩国人民竞争的人，所以韩国人民才会毫无顾虑地表现出对他们的敌对心。向青瓦台请愿，署名要求废除难民认证制度的告示板中有 714875 人签名，这在当时还创下了记录。那些助长对也门人恐惧心理的话语，即便被确认过是假信息也没什么用。因为这已经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成见，这种想法很难轻易改变。

但与此同时，他们还为自己辩解称自己并不是歧视主义者，自己的观点与建议并没有嫌恶与歧视的意图。2018 年 8 月，韩国政府在面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审议前，韩国社会曾举办过与之有关的讨论会。“联合新闻”对该活动进行过报道，以新闻方式对包括也门难民未决案在内的难民申请措施等常见问题进行了介绍。在报道过后，约有 7000 多条评论。评论主要是反对难民的的意见，其中就包括以下内容。

“真是令人火大，这是把韩国人民当成种族歧视主义者了吗？”

“我是养育两个孩子的普通市民，我并不是极右派嫌恶者”。

通常我们会认为什么样的人“歧视主义者”呢？

人们对于那些“做错事情”的人也有成见。比如当我们提到罪犯的时候，通常我们



会把他们当做是电影中出现过的极端坏人。但是实际上，当人们看到加害者时，也许会觉得“他并不是这样的人”。这就从侧面证明了自己已经对犯罪的人有成见。如果我们想到白人优越主义团体 KKK 杀人、放火的恶毒样子，就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人。但是，歧视确实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形成成见，也很容易对其他团体做出敌对行为。事实上，自己不存在歧视行为的可能性为零。

## 第三章：鸟看不见鸟笼

### 标签与污点

有人在网上上传了一个提问？

“人们对某某大学地区分校的认识怎样？”

人们开始很小心的跟帖。

“在校生对这个很敏感，所以在这里回答有点不太好。”

从最开始犹豫不决的对话，到后来越来越真实的内容。

“说实话，人们对分校不太友好。就不在这里说过多有关受辱的话了。”

“分校会成为人生的标签永远洗不掉。如果有逆流而上的信心，那去分校倒也没关系。”

下面是本校区学生说的话：

“我们不怎么在乎分校，即使有学生在乎大概也是敌视的态度吧。”

随着大家开始有来有回的掏心窝讲真话，就有一位上本校的学生这么回答其他的学生。内容如下：

“我们并不认为分校的学生与我们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说实话，站在本校的立场上很烦。因为别人会问你是哪个校区的。把分校的存在看成本校区的污点，这种想法是否太过了？”

对于学生的这番话，有人在下面跟帖回复了：

“我是分校的毕业生，成为你们的污点真是对不起呢。哈哈”

可能是出于对入学考试的考虑而出发的，小心翼翼的提问最终却以伤人心的"标签"和"污点"结束。在人们纷纷对分校做出各种负面评价的论坛中，有人跟帖道，自己毕业于分校，并给大家提出了一下建议。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人们对分校的认识都是有差异的，这是自己要承受的部分。如果你学习好的话，当然能考入本校区。我还上过本校区，好像挺好玩的。”

该学生认为，人们对分校的不友好视线需要自行考虑。因为每个人都有进入本校区的机会，所以在争取这种机会的过程中，失败的人需要承担失败所带来的结果。

我跟同学们进行过类似的交流。在对有关大学校区矛盾的讨论中，学生们认为只因为地方分校区就采用侮辱的话语是不对的。但同时，学生们认为本校区学生排斥分校区学生的行为情有可原，并对此表示理解。

“通过努力考进的大学，本校学生与分校学生自然不同。”

这种对话真的非常令人不舒服。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大学排名这回事，但是这已经成为不能拿出来讨论的禁忌。即使是再小心，也有人会因为人们坦率的话而受伤。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都没有人想要去改变这一秩序，只是一句“接受”就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 **想法成为现实**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本质。所谓的名牌大学，它们为什们很有名气？是因为名牌大学的教育质量更加优秀吗？考进名牌大学，有机会成为更加优秀的人，所以人们才偏爱这些名牌大学吗？还是说因为大学自带的“招牌”？换句话说，是因为考进名牌大

学，即使不做什么事情，光凭在名牌大学上学就能从中获得利益吗？当然，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前面提到过的本校区与分校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与教学质量有关的讨论。相比之下更像是围绕着“招牌”之间的问题。那么“招牌”到底是什么呢？

人们对于特定的大学有固定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的成见。这种成见很多时候并不是根据大学的具体信息而形成的。因为通过直接访问各大学，对各大学进行比较分析来判断各个大学的特征与是否优秀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即使是这样，人们根据自己脑海中的成见，就感觉自己好像了解这所大学一样。实际上，很多人是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时，看到大学配置表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所大学，然后根据成绩依次罗列可报考的学校和学科，通过这个顺序熟悉大学的排名。

在韩国社会，人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大学入学考试，因为这会给找工作、结婚以及人的一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既然如此，上排名靠前的大学自然会具有更大的优势。根据研究，出身于不同大学的人，他们对工资与人生的满足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简单来说，即存在“津贴工资”。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赚的钱更多。有研究表明“幸福与成绩是相匹配的”，那些毕业于排名靠前的大学学生，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满足程度更高。

母校的社会地位决定遥远人生未来的过度预见现象，并不能单纯地说明个人的能力或努力。把在人生某个阶段的某种特别考试，出人意料地当成预测人们几十年后的未来的指标并不容易被人接受。当然，大学本身带来的教育质量、人脉、机会等效果是存在的。但这其中，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不能忽视到大学“招牌”的重要性。事实是，这种“招牌”能锻炼个人能力，还能给人制造机会。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成见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也会带来积极的作用。人们对那些就读或毕业于名

牌大学的人的第一印象是“聪明有能力”。这种积极的成见是一种有利的偏见，也会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因为在日常生活与各种社会活动中，很多人会带着好意去接近他们，从而给这些人提供活动机会。名牌大学的学生们通过这些被给与的机会得到成长，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种循环中，偏见变成现实，现实又再一次强化了成见。

相对的，人们对于地方大学学生与没上过大学的人，具有负面型成见。正如有利的偏见一样，不利的偏见会造成损失。人们对于那些没能考进名牌大学的学生，认为他们“没有那么优秀、努力不足、事情做不好”。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常常成为现实。因为以这种偏见为基础的社会，给某些学生提供的机会相对更少，即使是他们做出同样的成就，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相对较低。这使得这些学生们更难得以成长和发展。

虽然对于群体的成见源于外界的视线，但也会成为那些成员看待自己的内心视线。人们对群体有归属感，同时接受这个群体作为自身认同感的一部分。因为这时候人们会把那个群体和自己等同起来，与群体有关的成见也会被自身吸收形成自身的成见，这种观念会影响人们的行动。随着成见在人们心中的扎根程度的不同，本人的能力可能变强也可能变弱。

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注意到负面成见（烙印）在人们心中扎根的现象。人们以他人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的价值，社会赋予的烙印会在他们的心里扎根，还会为自己感到惭愧和羞愧。结果就是，这并不会止步于个人层面。即使其他人没有公然做出歧视行为，但是本人的消极行为，社会自然地维持了这种差别结构。即使受到歧视，也会觉得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或者卑微，不采取抵抗措施。

实际上，光是感受到来自外界的负面视线，也会导致人们的个人能力下降。在美国的一项实验中，让数学考试分数相同的男性和女性参加者解答相同的数学题。按理来说

他们的数学解题能力相同，男生和女生的成绩应该不会出现差异。但是因为实验前研究员的一句话，实验结果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该研究主要是为了研究性别对数学能力的影响。”

因为这一句话，女生们的心情开始出现变化。她们想要打破“女生数学不好”的传统观念，这种负担影响了她们的行动能力。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在受到负面成见的刺激时，会产生需要战胜这种成见的负担。这种负担导致人们的行动能力变差，结果就如成见一样，产生负面结果。我们把这种压迫的情况称之为成见压迫（stereotype threat）。相反，那些没受到负面成见影响的群体，他们的行动能力会相对得到提高。因为在没有受到成见压迫的情况下，人们更少地怀疑自己和感到焦虑，所以他们的智力能力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负面成见的情况下，人们不会觉得受到怀疑，而是觉得受到尊重，不用害怕因为失败会导致降职或受到拒绝。

让我们看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就能很容易的知道附着在自己身上的负面成见是怎样产生作用的。例如，做过运动的人就会知道教练的态度对选手的影响有多大。“女孩子做的不错呢”，这乍看上去像是赞美的话，但是这却刺激着女性不擅长运动这一负面成见。在这种教练的指导下，想要坚持不懈地做好运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好比“地方大学学生干得不错呢”一样，这刺激着人们对那些地方大学生的成见，给地方大学生带来压力。最终，受到这种负面性成见的影响，地方大学学生的行动能力很容易出现下降。而这就是自己不希望看到的自我预言得以实现的时刻。

当然，人们并不是总是被成见牵着鼻子走。相反有些人会深度探索和思考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成见，并积极应对它们。正因为人们深知社会存在偏见，所以大家为了所谓

的“大学招牌”或者“职场招牌”开始了激烈的竞争。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偏见与差别的时候会如何行动。

### 那些“选择”歧视的人

我所属大学的原州校区，有保健福祉学院和科学技术学院两个学院。大部分人能很容易的猜到两个学院的学生性别比例会截然不同。以 2017 年为准，保健福祉学院（多文化专业、社会福祉专业、幼儿教育专业、护士专业）女生占比百分之 80.3，男生占比百分之 19.7。相反，科学技术学院（汽车机械工程专业、多媒体专业、产业经营工学专业、电脑工程专业）男生占比百分之 89.5，女生占比百分之 10.5。女生与男生的比例出现极大的差距，分别是 8：2 与 1：9。

而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我所在的大学。根据 2018 年韩国发布的教育统计资料，所有大学加起来，女生总占比百分之 44.4，虽然女生人数较少，但也快接近一半。但是从专业来看的话，情况却非常不同。根据各专业分类，在全国所有大学的学生中，幼儿教育、一般教育、护士专业的女性比例超过百分之 80。相反在金属机械、电子电力、交通运输、土木工程领域的女性比例低于百分之 20。

表 2：各专业女生比例

女学生多的专业分类	女学生少的专业分类
幼儿教育（96.4%）	金属机械（7.7%）
一般教育（82.4）	电力电子（7.7%）
护士（81.2%）	交通运输（13.5）

美术造型 (77.0%)	土木工程 (15.8)
初等教育 (70.7%)	电脑通信 (21.8)
特殊教育 (68.2%)	产业 (23.4)

注：该资料出自韩国教育开发院教育统计服务网 (<http://kess.kedi.re.kr>) 的“各专业学生人数”（调查日：2018年4月1日）资料。括号内的比例是所有学生中的女生比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呢？我们很难说是因为女性不擅长数学与科学，所以她们很难进入理工类专业。在2018年的大学考试中，女生在国语、数学的A卷与B卷平均分均高于男生。而且在2017年，女生在国语、英语、数学B卷考试中，平均分也高于男生，数学A卷的平均分也与男生持平。在这两年所有的A卷考试中，1、2等级的女性占比比男生多，但是在8、9等级的女性占比少。

如果说存在差异的话，大多女学生在大学数学能力考试中，没有选择理工类必须考的“A”卷。根据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的资料，2018年度数学“A”卷的应试学生中，女学生占百分之34.4，男学生占百分之65.6。虽然有些学生会因为数学成绩不达标而选择提前放弃，但是大多数女学生在准备入学考试的时候，直接选择了放弃理工类。

那么，我们要怎么看待性别与专业的关系呢？从算术角度来看，8:2与1:9的比率明显很不正常。但这是一种不平等吗？在与同学们讨论有关情况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平等现象。大多学生认为，这是学生们在没有受到强迫的情况下做出的自主选择。虽然我们可以把因为性别而迫使他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定性为一种不平等，但是我们很难说在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中出现男女比例失调有任何问题。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从女性角度出发，来看一下为什么女生被迫选择那些特定的专业。首先是因为女生的兴趣与职业能力倾向。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女性会扎堆选择教育或看护专业。但是实际上，即使女性具有这种选择倾向，也是因为她们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当我们在与多个国家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根据人们对性别观念的不同，女性选择的专业也存在很大差异。

2008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文化、性别、数学》论文中，研究者对OECD四十个国家的男女不平等程度与十五岁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显示，在男女不平等严重的国家，女生的数学成绩更低。雪莉·科雷尔(Shelley J·Correll)在她的《性别与职业选择过程：偏向性自我评价的作用》(Gender and the Career Choice Process: The Role of Biased Self-Assessments)中写到，女性在接受了自己不擅长数学的文化成见后，具有低估自己与避开选择与数学有关就业的倾向。

女性扎堆选择特定专业的另一个理由是可以找到就业前景。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院发布的《2016年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就业调查》，在大学毕业生中，进军“社会福祉与宗教”与“卫生医疗”领域的女性比例分别为百分之76.5与百分之73.3、在文化、艺术、设计、主播领域的女性占百分之63.9、教育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女性占比百分之69，这些领域的女性占比大。但在机械领域，女性仅占百分之5.3，在材料领域仅占百分之6.7，在电力电子领域仅占百分之12。相比这些领域，女性的机会更多。

表三. 大学毕业生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女性比例以及工资比例

	平均工资 (单位：一万韩元)	女性比例 (单位：%)	相比男性，女性的平均工资比例(单位：%)
金融、保险	272.20	46.5	80.0

法律、警察、消防、教导	253.66	35.2	81.5
机械	251.98	5.3	107.4
电力、电子	234.56	12.0	107.3
驾驶与运输	226.85	5.8	74.9
建设	224.63	22.5	80.1
信息通信	222.70	23.2	93.4
化学	216.55	26.2	73.8
卫生医疗	213.96	73.3	85.5
环境、印刷、木材、家具、 工艺与生产	204.10	28.2	91.6
营业与销售相关行业	203.00	35.3	70.6
经营、会计、业务	201.96	54.1	78.6
材料	200.78	6.7	65.1
美容、住宿、旅游、娱乐运动	189.69	50.6	76.6
军人	185.18	9.3	87.3
文化、艺术、设计、广播	177.78	63.9	86.0
教育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	171.40	69.0	95.5
社会福祉与宗教	165.86	76.5	92.0

食品服务	138.75	55.1	76.6
------	--------	------	------

注：资料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部提供的《2016 年大学毕业生职业移动路径调查》分析得出，该资料是以 2015 年的毕业生为对象所进行调查收集的信息。上表中出现的相关职种的指标不包括警备与清洁工、食品加工、农林渔业、纤维与服装、管理等职业。

但令人遗憾的是，女性在大多数职业中，整体收入偏低。如表三所示，虽然是同期毕业生，但是性别不同，工资水平也不同。女性在超过一半职业的平均工资不超过两百万韩元，但是男性在超过一半职业的平均工资超过两百万韩元。即使是相同的职业，女性总体上工资比男性低。正因为男性与女性选择不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

实际上，韩国的男女收入差距处于比较严重的水平。根据 OECD 的资料，韩国女性的工资比男性少百分之 34.6%，是 DECD 国家中最严重的国家。而这还是考虑到教育水平后的结果。虽然在教育水平低的情况下，男女工资差距更大，但是这次调查仅限于大学毕业的人，所以这意味着即使是在相同教育水平下，女性工资比男性低百分之 28。

那么男性和女性对专业与前途的选择真的与社会的歧视现象无关吗？作为女性，她们为了能在结婚生子后继续工作，所以会选择那些相对来说更有利的职业。这是在劳动市场与整个社会存在不平等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选择。不仅仅是女性，残疾人、非异性恋群体、移民等群体也已经意识到自身处于一种不利的条件下，会根据情况而采取行动。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个结果使得歧视得以继续维持。职业市场会根据性别进行分类，虽然这看上去对女性有益，但是相对的，女性工资低的状况却继续存在。人们对劳动价值的判断，并不会脱离社会整体对男女不平等的意识与政治影响力。在女性多的职业中，人们会因为女性过多而不认可她们所创造的劳动价值。

这是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女性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劳动，获得的工资却比男性低，这种现象从直观上来看，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歧视行为。但是女性从最开始就选择低工资职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如果女性自发选择进入对自身不利的职业，她们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结构性歧视（systemic discrimination）使得歧视看上去并不像是歧视。歧视已经在社会上蔓延，长期持续，在可以充分预见的时候，就会产生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各自发挥作用而形成歧视的情况。不仅仅是从歧视中获益的人，那些从歧视中遭受损失的人也会井然有序地行动，从而使自己成为不平等的结构的一部分。

有时，我们会有意识地为了迎合社会偏见而努力。那些爱穿牛仔裤和运动鞋的人，有时也会穿上笔挺的西装与皮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在面试的时候，为了达到对方所期待的样子而改变自己的风格，为了让自己符合该职业形象而做出努力。这是一种为了满足对方偏见而做出的有意识的理性行动。

越是面临人生中重要的选择，人们越是难以从社会的偏见中脱身。人们往往会为了获得最安全的结果而做出保守型的选择。吉野贤治在他的《掩饰》（covering）一书中注意到，那些自我认同受伤的人，往往会为了不让自己的标签太明显而努力包装自己。通过“掩饰”这一词，我们可以发现，少数者不能完全成为社会的主流的同时，还会被迫做出顺应社会的行为。

如果不存在歧视的话，人们是否会像现在一样做出相同的选择吗？在没有偏见与成见的社会，人们的关心与适应性又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

## 鸟看不见鸟笼

在 1947 年肯内特·克拉克 (Kenneth Clark) 与玛米·克拉克 (Mamie Clark) 的实验中, 我们可以很遗憾的看到, 偏见的种子在人们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心中生根发芽。实验以三到七岁的黑人小孩为对象, 实验时轮流在他们面前摆放了两个白色以及两个棕色布偶。实验者对小孩们进行提问并让他们选择对应的布偶。

“最想玩哪个布偶呢?”

“哪个布偶看上去比较善良?”

“哪个布偶看上去比较邪恶?”

“哪个布偶颜色的最漂亮?”

大多数的黑人小孩都喜欢白色布偶。百分之 67 的黑人儿童都表示想要白色布偶、百分之 59 的儿童认为白色娃娃看起来善良、百分之 60 的儿童认为白人娃娃看起来更漂亮。相反, 百分之 59 的黑人儿童认为棕色布偶看起来很邪恶, 只有百分之 17 的儿童认为白色布偶看起来邪恶, 剩下百分之 24 的儿童没有回答或表示不知道。

最后, 实验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哪个布偶最像自己?”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几个小孩嚎啕大哭。他们对于否定自我, 表现出不舒服和陷入进退两难的状况。也有一个儿童选择了与自己相似的有色人种布偶来为自己辩解。

“我皮肤被晒黑所以变得很糟糕。”

1954年，美国联邦大法院关注到这个实验并作出了重要的判决。被称为世纪判决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事件中，联邦政府废除了分离黑人与白人的学校的政策。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认为只要保障学校拥有相同的教育设施、教育过程以及教育质量，即使是将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分开教育也是平等的。人们并不认为将黑人与白人分离是一种歧视。

布偶实验是向世人展示现实并不如大家所想的一样的证据。分离本身就会给黑人儿童带来自卑，因为这种自卑，他们在教育中也只会取得更低的成就。像下面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一样，分开的学校设施本质上是不平等的。

在公立学校将白人儿童与黑人儿童分开，这会对黑人儿童造成不好的影响。人种分离的政策通常被解释为黑人群体的劣等，因此，如果依法这么做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 · ·）我们无法接受公共教育中的“分离但平等”的原则。分离学校设施从本质上来讲并不平等。

反过来想的话，人们内心深处的烙印与自卑，可能成为感知自卑与不平等结构的信号。本章节中提到的围绕大学排名所带来的心理不适，也许从侧面暗示了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存在。所谓的教育，本来应该给所有人提供成长的机会，但扭曲教育的本质会给部分人带来优越感，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自卑感。人们相信大学排名是公平竞争所带来的结果，人们努力回避这种矛盾的“标签”与“污点”很大。

玛丽莲·弗雷（Marilyn Frye）把这种压迫的状态比喻成鸟笼。当我们在近距离观察鸟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由一根一根铁丝组成的铁网。单纯的一根铁丝并不意味着什么，鸟并不会认为是这么一根根铁丝阻碍了鸟的飞行。但是后退一步，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正是这一根根铁丝组成的铁网将鸟关在了鸟笼中。我们也必须后退才能发现那些

关住我们的鸟笼，正是“由强压与障碍连接成的结构性网络”妨碍了我们挥舞翅膀。

您是否能看得见歧视行为呢？结构性的差别行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所以人们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在奴隶制度时代，奴隶被认为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女生没有投票权的时代，女生不能投票也被认为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借用奥兹莱姆·森索伊（Ozlem Sensoy）与罗宾·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的话，“我们的视野受到限制，相对于更大与相互找茬的模式，我们的社会更加集中于一种状况、例外与一次性证据。”

我们思想的视野受到限制。受到压迫的人，不能意识到体制所驱动的社会结构，而是单纯认为自身的不幸只是偶然和一时的事情。所以相对于与歧视做斗争，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并甘愿承受这些。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能感受到压迫的机会更少、视野受到的限制更多。所以他们理解不了那些声称自己受到歧视的人，还指责他们太“敏感”、“不满”、“试图享受特权”等。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公平持怀疑的态度。这个世界真的是公平的吗？我的人生真的与歧视无关吗？为了扩宽我们的视野，所有人都需要进行反思。如果有人站出来指出我们自己未曾见过的事物，我们应当把这视为我们发现视觉盲区的机会。如果缺少这种反思精神的话，我们只会一如既往的随波逐流，并不知不觉的加入到这种歧视的队伍当中。如果所有事情保持原样，我们就永远等不到实现平等的那一天。

## 第四章：玩笑话中却让人想拼命的理由

“用种族来搞笑好笑吗？”

假扮黑人能成为搞笑的题材吗？

在“寻找笑声的人”（以下简称“寻笑人”）搞笑电视节目中，一个搞笑演员试图假扮黑人来博得大家一笑，而受到群众的批判。该演员以黑皮肤、厚嘴唇、秃顶假发中间贴上大葱的形象登台，并表演了一段滑稽的舞蹈。在节目开播后，观众以“贬低黑人”为由对此批评，制片组也为此进行了公开道歉并删除了视频。出演节目的搞笑演员表示自己思考不周并向公众进行了道歉。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人之间开始的唇枪舌战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综艺人 A 通过脸书指责他们，问“拿种族来搞笑好笑吗？”。对此综艺人 B 回应到“把单纯的黑人打扮牵扯到贬低黑人，这是过于着急将其普遍化的错误。”让我们来看看 B 的回答。

如果你把单纯的黑人装扮牵扯到贬低黑人，那阿甘与阿呆的形象岂不是可以被理解为在嘲笑自闭儿童。之前，乌黑男子（一个搞笑角色）很长一段时间深受韩国人民的喜爱，难道那也是在贬低黑人吗？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阿甘、阿呆以及乌黑男子又再次被人们搬了出来。事实上，之前不知道有多少这种节目都来往于搞笑和贬低他人之间。虽然给人的感觉不尽不同，但这却是个很重要的提问。“傻里傻气”的英久与阿呆，现在依旧是家喻户晓的角色，那么这种形象真的是对残疾人的一种歧视吗？1980 年代，扮成黑人进行表演的乌黑男子也是在贬低黑人吗？乌黑男仔当时是 KBS 代表性喜剧节目《Showviva》的人气节目，之后因为节目人气很高甚至还出了唱片。而现在与当时是否有什么变化呢？



在这三十年之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有人站出来这“不好笑”。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我也曾因为阿甘、阿呆、乌黑男子的演技而开怀大笑。还有同学在学校模仿他们而成为学校的人气王。但是现在，我再也不会觉得这种喜剧很好笑。但即便如此，搞不好的话有人可能会说我对这种一笑了之的事情太过敏感，所以我也很难对此表现出不舒服。

黑人装扮的争论点在于“到底为什么好笑？”，这是一个相当深奥的哲学问题。而且将这种笑容与歧视联系起来，让人不禁思考这是不是“过于着急将其普遍化的错误”和“放大解释”。那么，当别人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一笑了之吗？还是说我们要上前与他们拼死理论一番？

### 你笑的理由

“寻笑人”的搞笑节目备受争议，以黑人装扮为素材的搞笑人物历史也再次凸显出来。所谓的黑脸（blackface），指的是打扮成黑人在剧场进行唱歌跳舞表演的形式。演员们将皮肤涂成黑色，嘴唇也画的很夸张，戴着卷毛假发还穿着破烂的衣服。在 19 世纪的美国，“吉姆·克罗”（Jim Crow）是以假扮黑人跳舞表演成名的搞笑角色的名字。从 19 世纪后半到 20 世纪中半，美国把将白人与黑人分离的政策统称为“吉姆·克罗法”，而“吉姆·克罗法”就起源于黑脸角色。

在美国，黑脸的形象曾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于童话、漫画以及各种搞笑作品当中，这也成为了黑人的典型形象。1950 年，随着民权运动的活跃，人们开始展开了拒绝采用黑脸表演形象的运动。人们认为黑脸是在贬低黑人并批判这是一种种族歧视。与此同时，公然使用黑脸形象也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禁忌。“寻笑人”中使用的打扮与黑脸的打扮如出一辙。演员们再次使用了以前典型的黑人形象，这种不合时宜的形象在 2017 年被

人们再次搬上韩国的舞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让人哈哈大笑的打扮也可能不再搞笑。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人们的笑点会随着社会的走向而发生改变。我们认为什么是幽默？认为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人开心？

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会因为看到他人的弱点、不幸、缺陷、笨拙而感到开心，笑是对他们的一种嘲讽表现。我们把这种观念称之为优越性理论（superiority theory）。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人们在看到比自己差的人时，自尊心会油然而生，心情变好并且会露出笑容。所以，人们觉得贬低他人很有趣，而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主要是人们觉得自己比他人更加优秀。

根据优越性理论，对于相同的场面，人们会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感到好笑，也有可能感到不好笑。人们对于那些让自己感到优越的场面会觉得好笑。对于那些感觉被人贬低的场面，人们会觉得不好笑。1972年道夫·齐尔曼（Dolf Zillmann）与乔安妮·康托（Joanne Cantor）的实验中向我们展示了，专家与大学生对于相同的场面是如何反应的。参与者处于上下级的关系（父母-子女、教师-学生、雇佣者-被雇佣者），他们观看相互贬低对方的漫画。实验结果发现，社会地位相对更高的专家认为，上级贬低下级的漫画更有意思。相反，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学生认为，下级损上级的场面更有意思。

群体之间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人们喜欢开那些能让自己所属团体产生优越感的玩笑，换句话说，人们喜欢去损其他团体。如果人们对对方群体注入情感，这时人们就不再会觉得这种玩笑会让人觉得有趣。人们只有对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并不重要的人开玩笑才会感到开心。如果我们对对方群体带有偏见的话又会怎么样呢？人们就会开始贬低那些不是自己所属、有距离的团体，并且开始寻找作为自己所属团体的优越感。

当然，这种幽默背后隐藏黑暗并不容易被世人所认可。即使是认可，人们也会想要隐藏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幽默都可以用优越性理论来解释。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这种笑容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以幽默戏弄某个群体，会伤害那些属于这个群体的人。所以“为什么好笑”的问题会被人们替换成“谁觉得好笑”这样的问题。那些因为看到打扮成黑人样子的人而感到好笑的人，他们所属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对于那些不觉得好笑的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又如何？

托马斯·福特（Thomas Ford）与他的同事们解释道，这种贬低性幽默会将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偏见暴露出来。一般来说，即使人们对某个团体带有负面性偏见，但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人们不会轻易显露出来。但是当某个人抛出这种贬低性幽默的时候，就会营造出轻度歧视也是可以接受的氛围。结果就是，社会规范约束力变弱，人们开始容易暴露出他们的偏见或者选择容忍这种偏见。我们把这种解释称之为“偏见规范理论”（Prejudiced norm theory）。

幽默是打开禁忌之门的钥匙。脱轨的行为通过幽默或是玩笑的名义被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太过于在乎这种轻松的对话反倒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正因为我们反复出入这些禁忌的领域，所以我们也以讽刺来挑战权威，社会也会因此而承认它的价值。但是打开这种禁忌的大门对于弱者来说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最近韩国社会出现各种嫌恶表现（hate speech）热词的现象，是对弱者的一种语言游戏。人们针对各种特定团体而制造各种词汇，并且这些词汇各大门户网站上流通。“屎南亚”（东南亚人）、“菊花虫”（男同性恋）、“供餐虫”（儿童、青少年）、“假牙虫”（老人）、“妈虫”（妈妈）等词汇，将人比做成“虫子”与“屎”，将人非人化。如果有人觉得某些人被当成搞笑的素材没关系，就意味着人们已经打开了对这些群

体偏见与敌视的大门。

上传这种词汇表现的人与被迫接受这些词汇的人之间存在着鸿沟，“嘲笑”的残酷性就存在于这种鸿沟之间。在这两者之间，当接受者称“这是歧视”行为的时候，上传的人则会说“并没有贬低的意图”，这种戏码不断上演。如果说没有歧视色彩的话，那他们又具有何种意图呢？也许大多数情况下是单纯为了逗人们笑。“寻笑人”用黑人装扮就是因为想逗大家笑。换句话说，这些事是人们的“搞笑欲望”或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好感而使用的手段。

2018年12月，在韩国残疾人委员会成立仪式上，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海瓚或许就是怀揣着这种意图，才会在他的祝贺词当中这么说道“政治圈中，有很多人让人怀疑他们的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很快人们就因为这句话纷纷对李海瓚进行谴责，说他的话是在“歧视精神病人”。李海瓚道歉称“我说的话并没有歧视的意图，但是却给大家造成了误会”。李海瓚说自己并没有歧视的意图，这应该是事实，因为这是他在残疾人委员会成立仪式上讲的祝贺词。相反，我们只有相信他是为了通过这种幽默来讨人喜欢才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政治圈中有很多人精神不正常”，这种幽默并不好笑。这句话是说给残疾人或对残疾人倾注感情的人听的。那么谁听到这样的话会笑呢？也许，这句话只适用于政治人。因为政治人士非常习惯于贬低自我，所以他们察觉不到这句话中带有歧视残疾人之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里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人察觉不到这是一种歧视行为，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政治圈内的人对残疾人漠不关心或者说认为他们并不重要。

之前说过在上传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着鸿沟，在鸿沟存在着残忍。戈登·霍德森

(Gordon Hodson) 与他的同事们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不把玩笑话当一回事这种想法本身就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和无视的态度有关。人们以幽默、恶作剧、玩笑的名义，贬低他人来博大家欢乐的时候，总有人会遭到嘲笑和蔑视。并且被戏弄的对象总是集中出现在“可以被戏弄”的人（弱势群体）身上，这种事情反反复复永无止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到底是踩着谁在笑。

### 称呼的权利

贬低性幽默有时与人们的社会地位无关，它可以指向任何人。但是它对每个人的影响不一样。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在不考虑社会地位的情况下，自己或自己的所属团体被贬低时，不管是谁都会感到不舒服。歧视作为贬低性幽默的素材，有些很容易被群体拿来使用，有些则不然。比如，我们很难见到人们将消防官当作戏弄的素材，相反人们贬低移民劳动者的话语却是层出不穷。虽然有时也有贬低政治人的情况，但是相比于人们日常中对残疾人的贬低来说，这算不上什么。

人们坚决反对某些幽默。在极右派网络交流网站“最佳日刊”中，网友把岁月号的牺牲者称之为“鱼糕”，很多人因此感到愤怒。相反，人们对某些幽默没有一点问题意识，处于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虽然人们并未从诸如“废物”“傻瓜”等贬低性的话中获得开心，但是也放弃不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汇。人们将某些幽默当成游戏，并且非常热衷于使用这种幽默。人们对于将某些群体当作戏弄的素材时带有的感情色彩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笑话谁呢？托马斯·福特通过实验发现，人们会根据社会对对方群体的价值判断，对贬低性幽默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于恐怖分子与人种歧视主义者等受到社会性批判的群体，人们在对他们使用贬低性幽默时表露出隐藏的偏见并没有什么效果。相反，

对于在社会中掺杂着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穆斯林、同性恋、女性等群体时，人们在对他们使用贬低性幽默时会暴露出他们内心隐藏的偏见。

福特的实验结果想说明内容的就跟他的论文题目一样，同样的贬低性幽默并不是对“所有群体”都有一样的效果。对于贬低穆斯林、同性恋、女性等受到社会歧视的团体的视频与广播，在暴露人们潜在偏见时具有很好的效果。因此，这种形式很容易造成歧视。作者在论文中提到，针对弱势群体的玩笑并不是单纯的玩笑，而是促进歧视的力量。

因为有关群体的社会评价与社会的环境有关，所以每个团体受到幽默的影响也不同。2018年，在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包容度的调查中，韩国行政研究院以全国 8000 名 19 岁到 69 岁的韩国人为对象，在询问他们对各个群体的看法。百分之 49 的人表示无法接受同性恋、百分之 12.6 的人表示无法接受脱北者、百分之 5.7 的人表示无法接受外国移民与外国劳动者。韩国社会不会停止对弱势群体的幽默玩笑，人们很有可能加深对他们的歧视的。

人们通常会通过嫌恶表现来暴露出他们在潜意识中拒绝非主流群体，最近韩国社会赤裸裸地表现出这种嫌恶。人们通过这种泛滥的嫌恶表现，在对话中更加自由地表达出各种偏见，以至于正在形成把歧视合理化的“规范”。这种现象与模糊不清的平等规范有关。在没有明确规定说歧视不行的情况下，这些幽默得以寄生。在社会真正出台禁止歧视的规范之前，人们通过幽默来贬低他人的欲望将会持续，也可能增长。

为了避免贬低性表现问题，社会正在替换这些词汇。“残障人士”或“不健全”被替换成“残疾人”、“残缺家庭”被替换成“单亲家庭”或“祖孙家庭”、“混血儿”被替换成“多文化家庭子女”。替换这种贬低性表现，意味着人们开始反省这些无意识的偏见。即使替换词语，这种标签与烙印并不会完全消失。“残障人士”、“多文化”

等用语将会再次被当成贬低性词语来使用。即使是替换词汇，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之心也并不会随着词语的替换而消失，这种贴在弱势群体上的标签会再次出现。

因此某些群体会将这种附有标签与印记的词，变成他们自己的专用名词（reappropriation）。他们积极使用这些词汇，赋予这些词汇新的积极意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非异性恋群体的“酷儿”一词。“酷儿（queer）”原本是用来嘲笑非异性恋群体的用语意思，指的是“怪胎”。但是非异性恋群体成员将这个词语变成他们自己的专用名词。他们声称“怪胎”有什么不好，“酷儿”是展现自己独特、独创性、多样性特征的自豪用语。

在韩国，人们把非异性恋群体庆典称作“酷儿文化庆典”。现在，“酷儿”已经成为非异性恋群体的专用词。“酷儿”一词，作为非异性恋群体的专用词，已经失去贬低非异性恋群体的效力。不属于非异性恋群体的人们失去了一个贬低非异性恋群体成员的武器。与“我们是酷儿，习惯就好了”相同的标语，是他们从语言上挑战权力与偏见，推翻它原有意义的运动。

2018年残疾女性人权运动团体残疾女性共感发布了“与时代不相容的不健全政治”的标语，计划推翻“不健全”这一标签。让我们来看看残疾女性同感团对该标语所作的说明。

我们铭记人们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与时代不符的存在所打上的“不健全”标签。我们虽然是不健全的人，但是我们拒绝曾经经历过的悲惨命运。现在，我们想赋予“不健全”这个词新的意义。社会与国家歧视和排斥那些不能自救的人，不健全的政治正是在这里兴起。我们希望和那些处于这种处境的非主流群体一起，“对正常与成长的价值提出质疑，希望重新书写依赖与团结的意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再次用“不健全”来称呼他们。我们只有共同参与到让残疾人得到完全尊重的运动中，挑战长久岁月中遗留的标签，在新的意义上才能重新使用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去列一个清单说，哪些词语表现是可以用在非主流群体身上，哪些词语表现又不可以用在非主流群体身上。

我们有称呼他人的权力。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玩笑来捉弄他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显示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力。相反当人们被贴上自己不想要的标签时，才会发现作为非主流群体成员的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是否以自己期待的方式被别人称呼着？我们是否又以别人期待的方式称呼着他们？你有多大的称呼权利，你又是如何使用这些权利？

### 没有反应的反应

如果我们能理解幽默与社会权力有关的话，就能估算出各种幽默的影响力。地位高的人以贬低性幽默来嘲笑地位低的人，这会给地位低的人的现实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地位低的人以贬低性的幽默去损地位高的人，可以瞬间释放他们的精神压力。在主流与非主流、教师与学生、雇佣者与劳动者、上司与部下、男性与女性、本地人与移民等多种权力关系中，幽默给双方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权力关系，只是将重心放到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嘲讽”就会令人出现错误。让我们来看一看人们对“泡菜女”和“韩男虫”的争论。鉴于“泡菜女”与“韩男虫”的贬低对象是所有的韩国人，所以这两个称呼都不可取。因为这两个称呼都是在侮辱他人，所以这不符合所有人都有权得到尊重的大原则。

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两个贬损性用语中包含的社会脉络也相同的结论。“泡菜女”指的是享受奢侈、给男性带来损失的女性。这句话衍射出男性对女性的评价，女性所展



现出来的行动偏离了男性对女性期待的样子。换句话说，“泡菜女”是因为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展现出端庄、简朴的样子，而赋予它约束女性的作用。对于“韩男虫”，我们不能从女性想用它来约束男性的层面来解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女性也拥有用称呼来“嘲笑男性”的权力。

所以，我们在看待“泡菜女”与“韩男虫”的争论时，应该跳过人们单纯对词语使用，必须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性男女歧视结构的感知变化来理解。历史上，这种现象在女性、残疾人、非异性恋等受到压迫的群体争取平等的过程中反复出现。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压迫而使用贬低性词汇，与为了抵抗现有权力而使用的贬低性词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双方都有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在废除不平等与维持不平等之间展开的紧张斗争之间，必须始终具备社会需要以平等的方向来解决问题的意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贬低性词汇表现，正因为这些表现很常见，所以问题更加难以得到解决。人们很难去对付那些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玩笑话，人们更是难以严肃起来。正因为贬低性幽默与戏弄是简单的玩笑话，所以反过来它又具有“无法被人们轻易挑战的强大力量”。这种语言攻击就好像扎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匕首，相反我们却很难说明这种玩笑话为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这种说明的机会转瞬即逝。正是我们的哑口无言让我们错失了这些斗争的瞬间。

在一个饭局上，我与某个律师事务所的元老级律师坐在一桌。他在包括我在内的法学院学生之间，一边笑一边大声说道“女的学习再好也没用，只有男的学习好才有出息”。坐在一桌的其他学生都对此一笑了之，我也不例外。但在回家的路上，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件事情，开始觉得有些生气。我对那么说话的元老级律师多生气，对我自己就有多生气。所以我下定决心，如果再碰到有人这么说话不会一笑了之。如果没有提出问题的勇

气，至少在那种情况下，我应该尽量保持不笑，不笑好歹是最消极的抵抗。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听众的反应会决定幽默的成败。所以“谁笑不起来”这个问题就跟“谁觉得好笑”一样重要。自从有人觉得“寻笑人”中出现的黑人打扮不再搞笑，这种贬低性幽默就被淘汰了。光是认为贬低他人和嘲笑他人不好笑，都能传递出“这种行动是不可取的”的信号。有些玩笑我们必须据理力争，即使把气氛搞僵。有些则需要用面无表情的方式，来表示我们的反对。

## 第五章：认为某些歧视是公平的想法

### 食用油套盒、女士、工作牌

在 2014 年的电视剧《末生》中，公司给张格莱（任时完饰）发了一套食用油套盒作为春节礼物。按理来说，张格莱收到了公司发的节日礼物，不应该不开心。但是公司给其他职员发放午餐肉套盒作为春节礼物。公司给正式员工发放了午餐肉套盒，给非正式员工发放了食用油套盒。观众们看到这个场面心情开始变得很复杂。明明是一个礼物，却着实让人开心不起来。比起收到礼物的开心，人们更多的体会到受到歧视的悲哀。在一件小事上受到歧视，这种无奈更让人伤感。

如果说公司是出于支出考虑的话，食用油套餐和午餐肉套餐价格只差了 1 到 2 万韩元左右。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说大大、说小小的价格差异感到伤感呢？何况这还是一个节日“礼物”。微小的差异令人受伤，这着实令人疑惑。就像前面第四节提到过的，日常中的“细小”差别，让人们难以应对。明明觉得哪里不对，却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韩国水原的一个居民中心把非正式女员工称之为“女士”。乍看是一种尊称，但从称呼的目的来看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把正式公务员称之为“主管”，但又不能把非正式员工也称之为“主管”，所以权宜之下，他们才弄出了“女士”这一称呼。如果是年轻的非正式员工，他们会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씨”(用在成人的姓氏、姓名或名字后，表示尊敬)，如果是年纪较大的男性，他们会把他们称为“先生”。问题是，他们可能觉得“씨”和“先生”都不适合 40 岁左右的女性。所以水原市的人权中心认为“女士”这一称呼是对非正式员工的一种贬低，是一种不合理的歧视。

水原市必须寻找新的称呼。当时有的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自治团体不区分正式职员

与非正式职员，也有的地方单独将非正式员工称之为“业务员”。水原市曾苦恼于要采用“主管”和“业务员”中的哪一个。但是员工们都表示更喜欢与其他公务员一样的“主管”称呼。但是水原市打算用“业务员”来划分员工也再次受到了人们的批评。难道他们就没预料到会被批评吗？为什么非要得在称呼上做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决策者可能认为不能把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一视同仁。

有些企业因用不同颜色的员工工作证来区分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饱受争议。比如“正式员工用红色、非正式员工用绿色”“正式员工用蓝色，非正式员工用灰色”等，让人一眼就能辨别出谁是正式员工，谁是非正式员工。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不会去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相反，有不少企业会采用不同颜色的员工工作牌或者临时出入牌来达到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目的。

食用油套盒、女士、以及工作牌颜色都是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方法。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员工呢？我们可以理解公司因为考虑到支出问题而选择发放食用油套盒和午餐肉套盒。但是对于“女士”与“主管”称呼、工作牌颜色，公司并不需要去考虑财政问题。公司在不用考虑财政条件的情况下费尽心思来区分员工，其目的就是为了区分。

### **认为歧视是公平的想法**

首先，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食用油套盒与午餐肉套盒的例子。假设一家大规模的公司正面临财政问题，公司在购买节日礼物时的预算有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使用？给员工发放礼物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根据职位、年薪、是否结婚、性别、工作成果等方式来发放礼物，但这些都取决于发放礼物的人。其中给所有员工都发放同样的礼物是最简单的方法。

在电视剧《末生》中，公司以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的标准来发放礼物。我们不能只把这当成电视剧中出现的插曲来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不仅仅只停留在节日礼物上，诸如此类的是事情还有更多。根据韩国劳动研究院统计厅对《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的分析结果，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百分之64到百分之65。只有百分之24.4到45.6的非正式员工能得到国民年金、工作保险、健康保险、退職金、奖金、加班津贴、带薪休假、教育训练等保障，这还不到正式员工的一半，虽然不是说作为正式员工就能享受到所有的优惠政策，但是相比之下，社会对非正式员工的保障率非常的低。

为什么人们就偏偏费尽心思去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呢？人们总是用“财政有限”把歧视合理化。事实上，如果单凭这一点是无法把歧视合理化的。还需要他们解释为什么财政有限的情况下，不给所有人发放同样的礼物，而是给正式员工发更好的礼物。如果说想将这种区分合理化，恐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单纯财政有限这一解释，我们还需要他们给出一个恰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在资源分配时有优先顺序。

对此，有些人认为区分是公平的，认为区分从道德意义上来说更为正确，所以我们需要进行这种区分。比如，我们对诚信、获得优秀工作成果的员工与不诚信态度的员工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在团队项目中，我们对待那些搭便车的人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人们认为所谓的正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相同的待遇，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成果而得到不同的待遇。

如果按照“同样的事物，同等的待遇”、“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待遇”的原则，那么为什么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收到不同的礼物、不能把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都称之为“主管”、需要用不同颜色的工作牌来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就非常好理解了。

因为从最开始，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就不同，所以人们认为他们理应得到不同的待遇。得到的待遇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有关的想法正是能力主义观点中所期待的公平与正义。

能力主义（meritocracy）是“有能力的话，谁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信念。正因为人们相信不管谁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爬上更高的位置，所以才会认为那些地位低的人，是他们自己没有尽最大努力。人们认为只要所有人都有爬上阶层阶梯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平等的。根据能力主义，真实存在的阶层，即不平等结构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这是对在竞争中付出努力的一种自动补偿机制，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如果从能力主义观点出发的话，很多不平等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即使本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也一样。即使女性在职场中遭受不合理的待遇，她们也会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些既没有能力又不肯努力的群体所遭受的差别待遇，也会被视为合理。人们会形成诸如“流浪汉不愿意工作”、“东南亚人懒”、“残疾人没有能力”、“肥胖的人不会自律”等与能力有关的负面成见，认为这些人蒙受损失也是合理的。

能力主义是努力多大，能取得的成就就有多大的简单和直观的信仰体制。人们被这种信仰体制背后的故事所诱惑。那些贫穷家庭出英雄的故事总是扣人心弦。正因为人们信奉能力主义，社会才会无言中给与那些取得特殊成就的人尊敬，想从考上好大学的人、找到好工作的人那里听到努力的过程。相比抱怨社会的不平等，人们更加的是抱怨“爬上高层的阶梯断裂”和“山窝里出不了凤凰”的世态。

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的话，那些不屈不挠破关斩将成为正式员工的人怎们可以和“不需要很大努力”就成为非正式员工的人相提并论呢？即使两个人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人们也会觉得两人受到同等的待遇是不公平的。重要的是，人们目前关心的重点并

不在两人是否从事着同样的事情、或者两人的实力是否有差异。人们为了守护这个庞大的信仰机制，无论如何都会对不同的人制造差别。

那么能力主义真的是公平的规则吗？

### 具有偏向的能力主义

如果想把能力主义变成真正公平的规则，必须具备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首先，需要制定各种评价能力的标准，不偏向任何一个履行这一规则的人。不让制定的评价标准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使所有受到评价的人具备相同的条件。并且，他人的评价，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当成评价个人能力的准确标准。现实符合多少前提条件？让我们来看一起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2010年，一名患有听觉障碍的学生毕业在即，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控诉。他主张道，一家公司的招聘条件中，明确要求新员工具有600分以上托业成绩，要求英语成绩对他来说是一种歧视。托业满分990分，听力占495分，剩下的阅读占495分。患有听力障碍的人因为听力部分，是不可能获得600分以上的。这种情况下，公司适当放低对患有听力障碍的人的托业分数要求怎么样？假如把分数降到300分左右的话，招聘条件又是否公平呢？

假设这家公司有很高的人气，申请的人又非常多。也许某些应聘者会认为这种标准不公平。那些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他们为了获得听力分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患有听觉障碍的人，他们不用在听力上投入时间与金钱，所以有人可能觉得这很不公平。即使患有听觉障碍的人以这种形式进入公司，其他人也会对他露出不善的目光。对于那些没有资格却受到特别待遇的人，有些人即使不会表露出来，但是会在心里蔑视他们。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要求所有人都考到 600 分以上才是公平的吗？如果这么做的话，患有听觉障碍的人士永远也进不了这家公司，难道这就是正义的吗？或者，对患有听觉障碍的人与正常人采取不同的招聘标准如何？尽量做到能让患有听觉障碍的人士能进入公司就是件正义的事情吗？对此，患有听觉障碍的人与没有听觉障碍的人可能会持有不同意见。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事情更加公平公正。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是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什么是正义的有效方法。假设自己在完全不知道是穷人还是富人，男人还是女人，能力或才能处于什么水平的情况下来制定社会秩序时，就可以脱离个人的利害关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正义的规则。在招聘条件是否需要托业分数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是否患有听觉障碍的，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规则呢？

如果托业分数是对应工作中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们不能说这种招聘条件是不合理的。所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提问，要求 600 分以上的托业成绩，这是否是工作领域中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标准？聘用擅长听力和阅读的人是否对该工作很重要。例如，如果是英语同传的话，可以肯定的说很重要。但如果不是这领域的话，比如工作计划、技术开发、系统运营等又如何？

对于这个提问，国家人权委员会认为该招聘工作领域并不需要英语听力技能。该工作的核心是策划、挖掘服务、技术开发、网站与系统运营，与英语有关的交流沟通只是附加技能而已。并且新员工的工作地点是在韩国境内，而不是国外。所以这份工作中根本不需要用到英语交流沟通。该公司以这为由使患有听觉障碍的人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因此国家人权委员会断定该公司违反了“禁止歧视残疾人与权利救济等相关法律。”

如果说，为残疾人提供其他的适用标准依旧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话，那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问题的本质。发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们在最初制定评价标准的时候，并没有留意到残疾人群体。也许制定评价标准的人和评价的人都不是残疾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想象中的应聘者中没有残疾人的一席之地。即使该工作过程中可能需要英语交流沟通，他们也没有站在患有听觉障碍人士的立场上想办法。这是完全是针对非残疾人而设计的能力标准与评价标准。

虽然对所有人采取统一的标准，看似公平公正，实则会成为一种歧视。在法官考试中，如果给所有人都提供一样的考卷、答案卡和考试时间，这对患有视觉障碍的人不公平。在烘焙技术考试中，如果不能提供手语翻译，这对患有听觉障碍的人很不公平。在公务员笔试中，如果不能提供代写笔记，这对患有脑病变的残疾人不公平。以上都是给所有人制定统一的标准，却给某些人带来不利情况的间接歧视（indirect discrimination）的例子。

之前在留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考试时会给不是来自英语圈国家的学生更多的考试时间。印象中，学校给我们提供了 1.5 倍的考试时间。我就读于法学院，虽然语言很重要，但是学校认为不应该在考试中评价学生的英语实力，所以学校才会出台这样的政策。多亏这个政策，来自非英语圈国家的学生才没有提前放弃考试或在考试中获得最低的分

数。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不断去质疑那些评判我们能力的标准是否有利于某些人又或者不利于某些人。至于招聘时要求托业成绩的问题？除了对患有听觉障碍的人不公平，是否还有其他不公平的因素呢？即使英语不是工作中必须具备的能力，很多公司还是会要求应聘者的英语成绩，这对于那些更容易接近英语的社会阶层、有特定学历或有着学阅条件的人不是更有利吗？

能力主义体制是无法避免偏见的人类所建立的制度。盲目地相信能力主义的人们，忽略了这个事实。所有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经济背景等，形成某种方向的偏见。什么能力重要，用什么方法来评价这种能力，都已经是在偏见的作用下做的决定。以这种选择出来的方式来评价能力的时候，出题人的偏好会有利于某些应试者，也会不利于某些应试者。

甚至，在某些看似客观的成果评价制度中也存在人们的偏见。艾米利奥·卡斯蒂利亚（Emilio Castilla）对一家以标准化的成果评价为基础实施年薪制大规模公司的 1996 到 2003 年的 8800 余名员工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即使获得相同评价分数，女性与少数种族职员的工资上涨幅度比白人男性更小。艾米利奥·卡斯蒂利亚觉得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即使获得相同的成果，上司给他们涨工资的幅度不同。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即使具备了客观性指标与标准化的系统，但是不平等不会消失，该过程中依然会有偏见介入其中。

但是那些标榜能力主义的人，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客观公正的。卡斯蒂亚与斯蒂芬·贝纳德（Stephen Benard）对那些标榜能力主义的人，实际上采取的行动是否更加公正进行了实验。假如这些人真正公平公正的话，他们应该给获得相同成果的男女职员发放统一的效益工资。但是实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那些标榜能力主义的人，对男性更为友好，给女性的效益工资更低。讽刺的是，那些不崇尚能力主义的人，对男性更加友好的倾向反而更低。

为何那些标榜能力主义的人表现出更加不公平？这正是因为人们产生自己没有偏向的错觉。当人们认为自己是客观公正的时候，就会更加偏向于采取自我肯定的行动，这偏离了现实。博诺伊特·莫林（Benoit Monin）与米勒（Dale Miller）在他们的实验中

也发现，那些曾经为性别歧视发声，向世人展示自己不是性别歧视主义者的人，他们的行动却更加毫无顾忌地暴露出他们更加偏向男性。卡斯提亚与贝纳德把人们在认为自己是客观公正的时候，采取更具偏向性行动的现象称之为“能力主义的悖论”（paradox meritocracy）。

那些决定和评价能力的人会偏向某些人，选定的评价方式很难保证做到对具有不同条件的人公平。并且，在这种评价过程中注定会出现失误。在考虑到这种限制的时候，如果只根据某一项评价结果来决定人们的优先顺序是非常危险的。并且以这种评价标准，赋予人们不同的人格待遇以及贴上永久标签会影响他人的未来，这是否才是真正的不公平与不正义呢？

### **能力不只一种，也不是全部**

能力不是只有一种，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不知道我们用特定的评价标准来判断他人能力的陋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第一次受到歧视的经历是小时候老师偏爱那些学习好的学生。学习好的学生能获得老师的信任、即使犯错也能很轻易获得老师的原谅，老师不会嘲笑他们，记得他们的名字并给予他们关心。以前我上的高中，冬天的时候，学校会把学习好的学生放在一起给他们安暖炉。

这种偏爱也几乎成为了一种制度。2009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收到投诉称，高中的普通班与尖子班编制是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的一种不合理的歧视。学校根据学生的成绩将学生分到“普通班”和“尖子班”。二年级和三年级各分有7个班，分别为4个普通班和3个尖子班。学校根据学生的一年成绩，把文科前60名和理科前30名的学生分到尖子班，其余学生均被分到普通班。

学校方面主张，这个制度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进行分班的，老师会根据学生的

学习水准提供适配的课程，是一种理想的教育课程。不把所有学生都放在统一水平线上进行教育，对学生个人需求提供适配的教育或许是一种好的学习方式。按理来说，如果学校的主张是真的话，那么普通班的学生和尖子班的学生都应该满足自己目前所受到的教育。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尖子班”和“普通班”的学生们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百分之 88.9 的“尖子班”学生对分班制度满意。相反，百分之 78.5 的“普通班”学生对分班制度不满意。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尖子班”学生都满意，所有的“普通班”学生都不满意。但这种压倒性的比例足以证明这种分班制度对“尖子班”的学生有利，但并不是对所有学生都有利。

分班也并不是以需求者为中心的教育方式。老师们对“普通班”学生的关心少，相比“尖子班”，老师们对“普通班”的学生更加漠视，对那些不学习的学生放任不管。学校优先把有丰富应试指导经验的教师分配到“尖子班”。还有些只有尖子班才能享受到的福利。比如学校只给“尖子班”提供打印或者补课。“普通班”笼罩着学生们因胆怯和感受到排斥而放弃学习的氛围，而“尖子班”则充满了学生有自信专心学习的气氛。

“不同的事物受到不同的待遇”这个命题是在不考虑人们所具备的各种条件下进行统一对待时会产生不平等的前提下成立的。所以成绩不一样待遇不一样，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是有误解的。这就好比是要求患有听觉障碍的人的英语听力成绩会造成歧视。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进行排名来区分优劣，意味着这会给一方给予尊重和支持，给另一方带来忽视和剥夺，这是不对的。补偿超过合理的水平并让胜者获得所有的机会与尊敬，就是胜者独食，而失败者需要承受所有的蔑视与排挤，这既不公平也不正义。

国家人权委员会认为，这所高中的分班制度是没有合理的理由来使用教育设施的歧

视行为。

实际上，给“尖子班”学生提供的印刷物也许对“普通班”学生没什么帮助。问题是，这种细小的差异会让处于敏感的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萌生看不见的歧视意识。而学校忽略了这样会培养“普通班”学生的自卑心理。“尖子班”学生对“尖子班”满意的理由是“营造了好的学习氛围”，这恰恰表示学校给“尖子班”的学生和教师们注入了更多的关心，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支援。学校应该考虑学生们的水平和特性，把这些关心与学习支援等资源均等地分配给所有学生。

2017年，在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实施的“人权现状”调查中，百分之28.3的儿童·青少年答道因为“学习不好”受到过歧视。这再次让我担心，我们是不是通过教育学到了不公正的能力主义，因此社会才会经常进行不合理的区分。